

国旗之子 陶维革

陶维号 冷冶夫 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国旗之子陶维革

陶维号 冷冶夫 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国旗之子 魂系国旗	镛 丞(1)
国旗讲稿	陶维革(68)
我在国旗下成长	陶维革(98)
难忘的一天	陶维革(100)
敬礼,国旗卫士!	傅昌波(102)
请代我向国旗敬个礼	陶维革(105)
国旗,镌刻在我们心中	傅昌波(107)
国旗之子	刘业勇 冷冶夫(111)
国旗高扬在我们心中	丁文礼(120)
国旗之子和一位土家小姑娘	冉瑞杰(125)
一位战士与一面国旗	刘雪松(128)
为国旗卫士壮行	傅昌波(135)
最后的辉煌	刘汉俊(138)
永远的眷恋	杨耕耘 郑元昌(140)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143)
国旗制法说明	(146)

国旗之子 魂系国旗

铺 丞

1996年6月6日，武汉汉口殡仪馆中央大厅，鲜花翠柏丛中，安详地躺着一位普通的退伍武警战士。

他身着橄榄绿军装，左胸前佩带32枚金光闪闪的国旗徽章和国徽徽章，身上覆盖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右手手心还紧紧攥着一枚国旗徽章。

上午9时整，武汉市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学的一队少先队员来到他的身旁，对他说道：“陶叔叔，我们将永远继承你的遗志，更加热爱祖国，热爱祖国……”

他，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武警北京总队天安门警卫支队国旗班原升旗手、被誉为“国旗之子”的陶维革。

一、响应祖国的召唤

立志报国

陶维革，曾用名陶卫旗，祖籍湖北黄冈。

1967年1月4日，陶维革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县宁港乡林港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据他的父亲陶金安回忆，陶维革幼小的心灵中，就知道家庭的贫困，知道父母的艰辛，从小就喜欢五角星，喜欢红领章，喜欢黄军帽。如果有哪位当兵的叔叔或大哥哥探亲回到家乡，他总是跟着跑前跑后，总希望能戴一

戴他们的军帽。因为他们是军人，他们最威武，最神气，他们是陶维革心目中的英雄。他梦想着自己长大了也成为一名军人！

日子清贫，过得也非常快，七岁不到的陶维革就上小学了。启蒙老师叫刘萍。这位乡村女教师，在武昌县宁港乡林港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教书45年，其中36年担任小学一年级班主任，4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3次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

“陶维革！我哪里忘得了他！他是我教过的学生中非常好的一个！”刘老师这样说道。她还回忆起一件事：“在陶维革上五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五十大几岁了，视力极度低下，但为了这些孩子，为了山区的未来，我每天仍然站在讲台上。有一天，我搭凳子擦黑板时，不慎从讲台上摔了下来，当即左踝关节骨折，骨头外露，流血不止。学生们吓得大哭，一时乱作一团。坐在最后一排的陶维革立即跑过来，第一个将我搀扶起来，坐在板凳上，并立即解下自己的腰间布带，把我的伤口包扎起来。然后他吩咐其他学生喊来老师和附近村的农民，把我送往医院。”

谈到这里，刘老师异常激动，她说：“陶维革平常是一位言语非常少的学生，而在老师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来帮助我的是他，第一个来看望我的也是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就是这位刘老师，从一年级起，她就给学生们讲五星红旗的来历、讲天安门的壮观、讲五星红旗的辉煌，并编成儿歌教学生唱。所以，陶维革从小就知道五星红旗是国旗，北京是首都。

陶维革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学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也是言语最少的学生，上课认真听讲。他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

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爱劳动、爱学习。当时那个班上，陶维革是第一批带上红领巾的同学。

班上有一名姓邱的同学，父亲早逝，陶维革便把自己的一支钢笔给了这位比自己还要贫困的同学。

在陶维革的学生时代，有一堂课印象特别深，直到参军之后，他与战友们谈过，在做校外辅导员时，也给少先队员讲过。

那堂课上，老师曾激动地讲到：“近代历史的100年中，为了几个钱，为了贪图个人享受，卖国、叛国、不爱国的人不断出现，以至于帝国主义和八国联军，仗着洋枪洋炮，多次侵略中国，他们打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洋人的铁蹄踏破祖国的大好河山，外国人的坦克把中国领土压得稀烂，山河破碎，人民遭殃，国家没有尊严，勤劳的中国人民受尽了欺负……”

老师的话牢牢地记在陶维革的心中。他立志参军，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

光荣参军

1984年，陶维革已经17岁了。

这年10月1日国庆节，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建国35周年阅兵式和群众集会。这是继1959年国庆阅兵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国庆阅兵，也是我国向世界又一次公开展示自己的武装力量。

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声中，三军仪仗队、军事院校、步兵、海军、空降兵、武装警察部队等8个步兵方队和装甲运兵车、导弹、坦克等4个机械化方队依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前。由94架轰炸机、强击机和歼击机组成的飞行编队掠过天安门上空，画出一道道美丽的彩虹。这次阅兵式，海陆空各军兵种、武警部队及首都民兵共有1万7千人参加。展示的武器

装备都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充分显示了我国强大的武装力量！

这一天，全世界人民都瞪起了好奇的、兴奋的、疑惑的眼睛。而看完阅兵式的陶维革，却瞪起了渴望的眼睛！他激动了好几天，当一名军人多么雄壮、多么威武啊！

当时他有三个哥哥正在外地上大学，陶维革梦想过与哥哥一样上大学，将来用自己的知识去报效祖国；他也想过毕业后去学手艺，用自己的双手去服务社会；这一次，他却暗暗下了决心，要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身躯去保卫祖国！

陶维革的祖籍黄冈位于大别山区，是革命老区。那里是中国的将军县，革命年代造就了许多老红军、老将军。李先念、秦基伟等革命前辈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许多前辈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解放后，那里每年都要输送一大批优秀儿女到部队。

17岁那年，陶维革把户口从武昌县转到了老家黄冈。不久，征兵工作开始了，招收的兵种有陆军、海军、空军，也有北京的武装警察部队。

他当然选择了后者。

陶维革背着父母，偷偷地与大哥商量了一下，就到当地人武部报了名。

人武部的王部长打量了一下陶维革后，对他说：“参军是保卫祖国、保卫和平、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一件光荣的事。但军队纪律严明，参军是要吃苦的，为了祖国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你做得到的吗？”

陶维革急了，以为王部长看不中自己，连忙说：“我从小就

在农村，是在泥巴里长大的，什么苦我没吃过！”

见他那恳切的样子，王部长很高兴，不用做思想工作就通了。

当陶维革接到入伍通知单告诉父母时，父母大吃一惊！母亲只是说了一句：“你已经长大成人了，随你吧！”做母亲的最大的快慰莫过于儿女长大成人。看见最小的儿子也懂事了，母亲心里当然高兴。

1984年10月底，陶维革终于如愿以偿，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军到了向往已久的首都，到了从小就知道的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

陶维革在家乡的十七年，虽然是生活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但是这片热土，早就在他的心灵深处牢牢扎下了爱祖国的根基。

心系国旗

不到24个小时，火车便到达了首都北京。陶维革和新战友们一道，带着好奇的目光，来到武警北京总队驻首都工人体育场新训二大队。

听说新兵训练结束后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去执勤、站哨，表现突出的还可以进国旗班，陶维革的训练劲头更足了。陶维革知道，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是世界最大的广场。在天安门广场，有高大壮观的天安门城楼，有象征中国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有讨论国家大计的人民大会堂，有研究、宣传中国革命和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陶维革说：“能到天安门广场站岗值勤，能成为一名国旗卫士，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

是无上光荣的。既然到了北京，有这样的机会，就要刻苦训练，实现自己到天安门广场去的愿望。”休息日的时候，他和两个战友还特意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

1985年元月，在新兵连训练快结束时，天安门警卫中队副指导员杜东学来到新训二大队挑选战士到天安门广场值勤。由于陶维革军事素质训练比较好，训练既刻苦认真又特别勤奋，当时新训二大队也想把他留下来。新训二大队领导“有意安排”陶维革到工人体育场看台顶层去“训练”。

其实，早在部队会操和训练抽查时，杜指导员就知道陶维革的表现情况，这次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陶维革带走。

陶维革当然也非常渴望到天安门广场。于是故意在看台顶上“偷偷”朝下看。当杜指导员发现顶层有新战士时，急忙上楼，一看是陶维革，第一句话是：“我要的战士找到了！”

又经过几次筛选，陶维革终于进了国旗班，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守卫天安门广场的国旗，也就是启蒙老师讲的五星红旗！

当天晚上，陶维革给父母写了他到达北京后的第一封信。他向父母报告了这个喜讯，并在已经非常详细的地址——北京中山公园警卫连后面，特意加上“国旗班”三个醒目的字！

二、在国旗下成长

百炼成钢

来到国旗班，陶维革他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爱国主义教育。课后，警卫中队领导带领新战士参观了国旗哨位、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

面对国旗，陶维革和新战友们举起右手宣誓：我们是祖国

的儿子，我们要为祖国贡献一切。

是的，作为祖国的儿子，是一种极高的荣誉，祖国的儿子就应当为祖国争光！祖国的儿子就应当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只有将自己的一生交给祖国，才真正算得上祖国的儿子！

能到首都北京当兵不容易，能进国旗班也不容易，但要成为一名升旗手则更不容易。因为作为升旗手，干得好可以为国增光，干得不好则会损害祖国的形象。因为国旗是祖国的象征，升旗手的岗位在祖国第一哨，职责就是护卫国旗！

特殊的任务，必须经过特殊的训练，以具备特殊的素质。无论是政治素质培养，还是基本功训练，升旗手都要比一般的战士付出更多的血汗。

为了早日成为一名升旗手，陶维革进行了比别人更艰苦的训练，自己经常“偷偷”增加训练量。他们训练的有些故事，不仅鲜为人知，令人难解，而且在我们看来似乎不近人情。

作为国旗卫士，站岗放哨，“站”是第一位。

为了练“站功”，陶维革的办法是：头顶砖头，两眼平视前方。双腿绷直，腰杆挺直，脖子伸直。腿绷不直，就用绑带把双腿捆在一起睡觉；腰杆挺不直，就绑十字架，睡觉不用枕头；脖子伸不直，则在衣领边别上大头针，头稍偏就会挨扎。贴墙根站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双腿麻木失去知觉。

刚入伍的新战友李俊峰练站功昏倒了，醒来后又要接着练，班长劝他休息一下，他说，自己素质差，如果在天安门广场昏倒了多丢人，也有损国旗的形象。

陶维革深深地被这一幕所打动，并以此激励自己更加刻苦训练。陶维革只要往国旗下一站，两手中指就从不离开裤缝线！

“站”要有站“像”，“走”则要有走“样”，就像三军仪仗队一样，走“样”直接关系到升旗仪式的整体形象。

为了练“走功”，陶维革和战友们拉上五根 25 厘米高度的绳，在腿上绑砂袋，踢腿与绳平行，摆臂与上衣第三衣扣同高，行走步幅 75 厘米，一步步走，一天天练，三年下来，相当于正步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陶维革在国旗班 6 年，用正步将近走完了两个二万五千里！

站岗放哨，得明察秋毫，还需要有扎实的“眼功”。

为此，陶维革和战友们摸索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迎风站立，睁大眼睛，眼泪顺着脸往下流，慢慢地，两眼发麻、发木，到最后什么感觉都没有了，等意识到要闭眼了，眼皮都不听使唤，只有用手擦几下脸才能恢复。

为了练直腰，他们睡觉不用枕头。在国旗班驻地，人们看不到枕头。

为了走正步时摆臂有力，他们双手伸开托起砖头练习。

摸爬滚打更不用说了，陶维革的左肘关节肿胀，右肘关节受伤，永远有个疤痕作纪念。当时陶维革生怕排长知道后不让练习，谎说“没啥”。足尖绷直了，当时不觉得疼痛，5 年后发现趾甲往肉里长，最后做了拔甲手术。

在谈到训练的情况时，陶维革曾经讲过一件有趣的事。他说：“在炎热的夏天，我们有时一练也是几个小时，一些观看的学生口里不断发出‘啧啧’的惊讶声，有的拿着冰棒看呆了，看着看着，冰棒化成了水。”

走进国旗班当年的宿舍，在陶维革的床正上方，张贴着“护卫国旗、重于生命”几个醒目的大字，这是陶维革的信念，也是每一个国旗卫士的信念。

他把这几个字贴在床边，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眼就看见它，每天睡觉前最后的一眼看见的也是它，直到带入梦乡！

他，早已把自己与国旗融在了一起！

青春无悔

在天安门广场站岗格外光荣，但也异常艰苦。

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天安门广场。身着短裤裙、薄衣衫的游人们，撑起遮阳伞，甚至站在树荫下还觉得酷热难耐。而国旗下的地面温度高达 48 摄氏度，陶维革和战友们却身穿礼宾服，头戴大檐帽，脚蹬大皮鞋，手戴白手套。为了祖国的尊严，他们一站就是两个小时，警容严整，纹丝不动，一班岗下来，衬衣衬裤能拧出水，皮鞋里能倒出水。

数九寒冬，寒风四起，但为了祖国的尊严和国旗的形象，战士们不能穿得太厚，站岗时虽然戴棉帽，但不愿放下帽护耳。两个小时的礼宾哨，风往衣服里灌，也不得缩脖子，耳朵、手脚冻得再痛，也不得搓手、跺脚，而要纹丝不动。

有的人把苦和累联系在一起，而陶维革他们却把苦和乐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多站一班岗看成一种幸福、一种快乐、一种享受！

陶维革说：“多少中国人向往北京天安门，向往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而我们每天都工作在天安门广场，并且能亲手把五星红旗升上天空！”

谈到冬天在晚上值勤的感受时，陶维革说：“大风中，升旗用的钢丝绳，不停地撞击旗杆，这声音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夜，开始感到厌烦，后来听得时间长了，反而觉得和谐、悦耳，我们戏称为《寒夜交响乐》。”

陶维革也常对人讲：“尽管经常加班加点，训练极为严格，

站岗异常艰苦，可是当我们一走进广场，走上那神圣的哨位，看见烈士们用鲜血染红的高高飘扬的国旗，我们心里就感到无比的充实，浑身上下便充满了力量。”

尽管陶维革的手、脚或耳朵冻破了皮，训练时受了伤，但他挺拔的脊梁却从来没有弯过！

陶维革的坚强、刚毅和忠诚，就是这样练就的。这股子坚强、刚毅和忠诚，使陶维革伴随着国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炎热的夏天和刺骨的冬日，同时也征服了人们的心，赢得了人们的尊敬。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只要你到天安门广场，你都会看见共和国的国旗下陶维革那棵挺拔的“青松”！

尽管每天的升旗动作是那么单调，每个人的生活又是那么简单，但陶维革他们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让五星红旗在首都的上空、祖国的大地上永远高高飘扬。

曾经有一位广西人问陶维革：“干升旗这工作，又苦又累又学不到技术，值得吗？”陶维革说：“干升旗这工作，的确又苦又累又学不到技术，但我觉得值得。因为我们所升起的不仅仅是一面国旗，升起的是祖国的尊严和骄傲，升起的是中华民族十多亿人的希望！”这也是每一个战士的真切感受。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陶维革把护卫国旗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第一次升旗

1985年春节后的一个早晨，陶维革提前醒来，实际上他一夜未合眼。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经过艰苦的磨练，经过多少次的恳求和多少次的保证，排长终于答应他：“明天参加升旗。”那天，他穿得最整洁，头晚已把皮鞋擦得亮亮的，礼服用

熨斗烫了一遍又一遍。

清晨，天刚蒙蒙亮，北京城的喧闹声还只刚刚开始。

陶维革肩扛国旗，从天安门城楼拱形大门出来，经过金水桥，与两位战友迈着有力的正步，沿着整个首都北京的中轴线，“咔、咔、咔……”，走到天安门广场北端的旗杆下。余光中，陶维革看见已有几千双眼睛耐心地等待着那庄严而神圣一刻的到来。

他按动电钮，“敬礼”，国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陶维革说：“当时我的心也随着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我仿佛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我也仿佛把五星红旗插在了喜马拉雅山顶和联合国大厦！在国歌声中，我仿佛听到长江在呐喊，黄河在咆哮，仿佛中华民族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英雄壮举，也想起了毛主席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的动人情景。我心中在欢呼，浑身热血上涌。在小的时候，向往的是天安门，渴求的是五角星，而今天，我不仅站在了天安门广场，而且终于成为一名升旗手了！”

升旗后回到营房，陶维革的心仍在怦怦地跳动：“今天的升旗合格吗？动作利索潇洒吗？明天还安排我升旗吗？”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偷偷窥视排长的表情。终于听到班长和排长的对话声“可以”。他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从来没有这么高兴的事情！

当天晚上，他又给父母写了第二封信。

精忠报国

国旗卫士身材高大，身体匀称，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亮亮的，看上去很潇洒，但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却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潇洒”。

当年的国旗班住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西北角的一个小院子里。简陋的屋子被一个砖砌的火炉占去了五分之一的面积。那里有两排低矮的小平房，高个的战友的头经常碰到低矮的门框，房屋低矮使睡在上铺的战友一起身就会“顶天立地”。房顶长满了很高的茅草，墙皮不断脱落，地面天天扫，每天都能扫出一堆土。战友们挤在一起，行动总是很小心，怕碰掉墙皮。夏天屋里闷热，没有电扇，呆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只好摇扇子驱暑消汗。整个住地只有一个水龙头，上厕所要走蛮远。

自从国旗班对社会开放后，不知有多少人到这小屋来过，从普通老百姓到市长，从士兵到将军，从一般干部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这儿如果没有人领路，很多人会以为走错了地方，因为他们眼前的老屋与他们想象的相差太远，与战士们所从事的那神圣的事业反差太大。人们以为他们住得很高级！

北京市无臂书法家刘京山，看完国旗班的驻地后，饱含激情，用嘴咬住笔写下了八个大字：“身居陋室，精忠报国！”

住房拥挤倒没关系，住房简陋也没关系，陶维革他们所关心的是国旗没有个“家”。国旗没有安身之处，战士们每个人心里都不踏实。

最初降完旗扛回来后一直斜放在屋檐下，不久，旗柜做好了，国旗有家了！战士们心里甜滋滋的，感到比自己住高楼还高兴！

国旗班就像一个大家庭。虽然战友们挤在几间矮小的红房子的小院里，但比亲兄弟还要亲。战友们经常一起聊聊天，“侃大山”，谁家有困难，大家都会共同想办法解决和支持。在这个大家庭里，没有矛盾，没有争吵，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升好旗、守好旗。

朴实情怀

天安门广场也像一所大学校，国旗卫士们从站岗放哨和升旗仪式中受到教育。

每天升旗守旗时，都会有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他们。人们来自全国各地，来自各个民族，有的是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他们对祖国的爱、对国旗的情，也都深深地感染了战士们的心。

很多人向往天安门广场，想观看一次庄严的升旗仪式，但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实现。

西安一位叫胡扬的年轻人在给陶维革的信中说：“多少人把能目睹一眼升旗仪式作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但你却幸运地亲手升起过它。”1995年5月12日，他赶头班车观看升旗，跑步到广场，可是国旗已升上了顶。下午他又早早来到了广场，终于观看了降旗仪式。他说：“这样我就无愧于当代的中国人，无愧于自己是一个党员。”

要知道，有多少人像胡扬一样，把升降国旗看得如此的神圣啊！而站在祖国心脏、站在祖国第一旗下的陶维革和战友们，除了感到无上的光荣外，当然也受到心灵的震撼！

陶维革每次给他的同学、他的兄弟姐妹和父母亲写信时，之所以要在已经很准确的地址“北京中山公园警卫中队”后面，特意加上“国旗班”三个字，一是要把国旗班的荣誉带给他的亲人和朋友，二是请他们放心，一定会尽心尽力护卫好国旗！

1986年，武警部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陶维革向指导员要了几份国旗班战士自己整理的国旗讲稿，一份寄给了湖北武昌县教委，一份寄给了自己的母校——宁港中学。1988年，他把自己积攒下来的60元生活费，寄给母校支援学校建

设,希望母校培养更多的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1985年,部队号召献血,陶维革第一个报名,一次就献了200毫升。

在天安门国旗班这个大家庭和学校里,陶维革立了功,受了奖,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陶维革写下了“国旗就是我的生命”、“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誓言,决心为祖国和国旗奉献自己的青春。

三、国旗高于一切

“国”情大于“亲”情

对于国旗卫士来说,再苦再累他们都能挺得住,再大的困难他们也能克服。然而,有一件事却使陶维革为难了。

1987年冬天,陶维革的母亲患了出血热,母亲怕影响陶维革站岗放哨,开始没有告诉他。病危时刻,母亲想在临终前看一眼自己的小儿子,于是就给陶维革发了电报。

陶维革收到电报后左右为难:三年多了,一直未能回家看看老母亲。母亲病危,当儿子的应当看望,然而部队勤务正紧张,班里人手又不足,这里正需要我,我怎么能离开呢?母亲哺育了我,祖国培养了我,没有祖国就没有母亲,就没有我们的家。他想起母亲当初嘱咐过的话,“好好干,莫调皮,干出个样儿来,家里光荣,我们也放心”,军人的职责使他决定不回家了。

随后,他把电报默默地丢进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垃圾堆里,然后提笔写了封信给家里的大哥,拜托他照顾母亲。

事后,陶维革在谈这件事的体会时讲:“我不赞成当兵三年无孝子的说法。我觉得,为祖国献出一切的人、不给父老乡